

《楚辭》英譯的思想性、審美性與經典性*

嚴曉江

[提要] 《楚辭》博大精深，典麗晦澀，文體獨特。《楚辭》英譯應彰顯原作的思想性、審美性與經典性。楊憲益與戴乃迭、孫大雨、許淵沖以及卓振英的《楚辭》英譯活動，體現出強烈的民族自豪感和深沉的歷史責任感。他們注重文化傳播和精神共鳴，以“忠實性”為翻譯原則，借鑒英語詩歌的詩學規範進行審美移情，用清楚、通順、精煉的現代英語闡釋原文中滲透的仁義、忠誠、賢明、和諧等中華文化核心價值觀念，使屈原精神以及楚風楚韻在異域文化語境中得以接受和傳播。

[關鍵詞] 《楚辭》 英譯 思想境界 審美意蘊 經典品位

[中圖分類號] H05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7) 02 - 0060 - 06

《楚辭》瑰麗宏闊、鋪排誇張、言辭華美、意境深遠，是後世詩文和辭賦創作的典範。屈原“天人合一”的世界觀、捨生取義的生命觀、內美修能的人生觀、發憤抒情的詩學觀在中國文學史上獨樹一幟。《楚辭》英譯聯接古今、祁通中西，“需要我們有站在傳承世界優秀文化遺產的高度，體現出傳承屈原精神和建設屈原文化的大視野和大氣度”。^①文學創作的本質是精神探索和思想交融，譯者須跨越時空界限，與詩人心心相印，感悟並傳遞《楚辭》的多維價值。

《楚辭》直到 19 世紀末才有英語譯本，其中多數是由西方漢學家翻譯的，並且以節譯和選譯為主。2000 年以後，國內出版了楊憲益與戴乃迭、孫大雨、許淵沖、卓振英的《楚辭》英譯本，^②包括舊譯再版和新譯初版，這四種較為完整的譯本是翻譯家們向世界推介中國典籍精品、弘揚中華文化精髓的體現。楊成虎、余燕、馮斗、繆經、郭暉等學者或選取《楚辭》中的某個篇目總結翻譯特色，或選取其中的兩、三個版本概括譯者的翻譯觀點等問題，或將《楚辭》的某個譯本與西方漢學家的譯文對比，^③目前尚未有學者將這四種英譯本放在一起進行比較研究。本文聚焦這四種《楚辭》英譯本，從思想性、審美性與經典性的角度，以《哀郢》、《離騷》、《橘頌》、《懷沙》、《天問》中的譯文為例，透視本土翻譯家們在向英語世界譯介《楚辭》中的共性與特性。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後期資助項目“《楚辭》英譯的中國傳統翻譯詩學觀”（項目號：14FYY002）的階段性成果，獲江蘇省 2014 年度高校“青藍工程”、南通大學“拔尖人才”基金（通大人〔2015〕5 號）資助。

一、傳譯屈原精神，彰顯思想價值

以理性因素和道德情感為內核的屈原精神具有普世價值。“詩人寧可付出自己的生命，也不放棄遠大理想，向黑暗現實妥協。人生態度的抉擇深刻反映了詩人徹底的理性精神，而生死抉擇則集中表現了詩人崇高的道德精神。理性精神與道德精神的完美結合，構成了屈原精神和品格的基石。”^④翻譯的深層影響主要在於突出經典原作的精神傳播意義，客觀傳遞中國形象、譯好中國典籍是當前需要深思和踐行的重要問題。《楚辭》英譯應反映特定的歷史背景、深刻的哲理情思以及堅韌的民族精神，讓目標語讀者更好地瞭解、尊重、認同中華文化價值觀。這是不同文化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的過程，有助於形成全球文化多元發展的局面。優秀譯作能使經典原作實現其固有價值。楊憲益與戴乃迭、孫大雨、許淵沖、卓振英深入挖掘屈原的內心世界，以忠實於原文內容為根本翻譯原則，傳譯屈原的愛國情懷、忠君情結、堅貞品性、清俊風骨。

例 1：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戚。（《哀郢》）

My Woes too many to express, // Lonely, an Heir to all Distress.^⑤（楊憲益、戴乃迭譯文）

So deeply woebegone, I fail to set up, // Distressed, disrupt in mind, I have anguished got.^⑥（孫大雨譯文）

My sadness cannot be expressed, oh! // In despair my grief is compressed.^⑦（許淵沖譯文）

No word so far, I'm driven to despair, // And my heart is laden with woe and care.^⑧（卓振英譯文）

屈原敘寫了自己被迫離開郢都，沿著長江、夏水沿途流亡時的深沉憂思：“內心悲傷憤懣理不清頭緒啊，失意之人只能默默悲戚。”^⑨詩人在《哀郢》中抒發了對楚國的熱愛之情、對民眾的深切同情、對理想的不懈追求以及對奸臣的強烈譴責。四種譯文都傳遞了原文的具體信息，“Woes” “Distressed” “sadness” “despair”等關鍵詞的使用表現了一種壯志難酬、憂鬱憤懣的心理。儘管不同民族的文學創作具有很強的個體特徵，然而人們認知活動和審美活動的本質又使得文學創作具有共通性。譯者與作者心神相交、靈魂相照，這樣才能以情譯文。美國學者喬治·斯坦納（George Steiner）提出了基於闡釋學分析的四個翻譯步驟：信賴（trust）、侵入（aggression）、吸收（import）、補償（compensation）。所謂“信賴”，就是譯者相信原文是有意義的，而在理解和表達這種意義時，譯者的主觀因素會不可避免地“侵入”到原文中去，“侵入”的目的是“吸收”，但“吸收”的過程又難免喪失譯語的本色，這就使得“補償”十分必要了。^⑩可以說，一切翻譯活動都開始於信賴，翻譯家們堅信《楚辭》的經典地位以及藝術魅力，在紮實、深入研究文本的基礎上，闡釋屈原的美政理想、民本意識、昂揚鬥志以及高潔人格，使陌生、晦澀、古雅的本體在英語文化語境中獲得新生。在世界範圍內，荷馬、但丁的讀者遠遠多過屈原，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屈原作品本身文字很深，翻譯困難，濃重的民族倫理文化內涵與西方人的審美意識、傳統觀念有相當的距離，這就有意無意地削弱並影響了屈原的地位與知名度。^⑪因此，讓屈原及以屈原作品為主的《楚辭》走向世界，是時代賦予中國翻譯家的神聖使命。

楊憲益早年在英國留學期間，閱讀了大量英語詩歌，十分鍾愛朗費羅、拜倫、雪萊等詩人的作品，從中感悟的是自由、平等、民主的氛圍，這與《楚辭》中的積極浪漫主義精神有很大契合之處。他曾撰寫舊體詩《雪》與《死》，其中的憂患意識與屈原“上下求索”以及“雖九死其猶未悔”的精神不謀而合。孫大雨是新月社後期詩人，他於1930年秋完成耶魯大學兩年的學業後，毅然回到當時水深火熱的中國。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雖然歷經艱辛，但是仍然對祖國的前途

充滿希冀，這與屈原在遭排擠、被放逐的境況下卻始終心系社稷、追求美政藍圖的情懷頗為相似。他將《離騷》譯成“Suffering Throes”，突出了“遭受苦難”之義和憂國之情。許淵沖十分強調中國傳統文化如何在世界發揮自身的影響力，尤其是在翻譯方面，應該改變中國人不如外國人的心理，中國有不少能進行中英互譯的翻譯家，譯學要敢為天下先。^②卓振英認為典籍英譯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載體，並且指出，對《楚辭》的注釋要運用考據和訓詁的方法，以確保翻譯有據可依：“英譯若要作為權威版本來要求，首先就應該力求成為詮釋方面的集大成者，切不可率爾為之……通過考辯、考據，尚能有所鑒別、有所發現、有所突破，為英譯提供了較為堅實可靠的基礎”。^③

顯而易見，譯者的民族意識對翻譯選擇有很大影響。楊憲益與戴乃迭、孫大雨、許淵沖、卓振英的《楚辭》英譯活動體現了本土翻譯家的勇敢擔當，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楚辭》由西方漢學家為主進行翻譯的局面。雖然翻譯工作充滿挑戰和艱辛，但是他們不畏艱難，發掘、提煉《楚辭》中超越時空的中國文化元素以及強大的精神力量，使屈原精神能在世界範圍內發揚光大。

二、再現審美要素，遵循英語規範

《楚辭》的審美情感積澱著歷史背景與社會生活的情愫，譯者應再現《楚辭》情理交融的哲思美以及詩人陳情言志的境界美。“《詩經》和楚辭，一南一北，構成了影響戰國以來中國人審美生活的兩大因素。如果說北風是廟堂的，民俗的，而南騷則可以說是自我的，藝術的。”^④《楚辭》之美通過語言來表現，而漢語和英語表達美的手段存在很大差異。對於涉及古今轉換和漢英轉換的《楚辭》英譯來說，需要譯者具有深厚的文學修養、敏銳的洞察能力、靈性的思維方式。情景交融的美學解讀和翻譯過程中的審美移情是一個主體與客體互為關聯的思維過程。雖然翻譯家們在審美傾向、審美判斷以及審美表現方面不盡相同，但是都通過自己的審美再創造活動展示《楚辭》的意美、音美和形美。在這個過程中，必須遵循英語詩學規範，符合英語的形合特徵。

例 2：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離騷》）

I went at Dawn high Heaven's Ford to leave; // To Earth's Extremity I came at Eave.^⑤（楊憲益、戴乃迭譯文）

At morn, setting off from the Celestial Ferry, // Before dusk, I reach the western extremity.^⑥（孫大雨譯文）

At dawn I start from Heaven's Ford, oh! // At dusk I reach the Western End.^⑦（許淵沖譯文）

At dawn from th' Heavenly Ford of the Milky Way // I start out, destin' d in th' eve for th' Western Extreme.^⑧（卓振英譯文）

屈原展開豐富的想像，描繪了自己在政治理想渺茫時的艱辛求索歷程：早晨從天河渡口出發，晚上到了西面極遠之地。景物地點的變遷詩意地呈現了詩人的心靈延宕過程。該詩句的語義相互關聯：“朝”與“夕”的呼應顯示出時間變化和緊迫之感，“發”與“至”分別搭配“天津”與“西極”，結構齊整。四種譯文以主謂結構為主幹展開，修飾成分放在前後，層次分明，“at”“from”“to”“before”“for”等虛詞的使用使得譯文顯性形態標記清晰。由於英語有時態、語態、語氣、單複數、連接手段等方面的形式特徵，時間、地點、事物、人物之間的各種關係變得清晰明白，《楚辭》英譯必須兼顧邏輯關係、結構脈絡等要素。詩人緣情而發，《楚辭》言約意深。譯者們作為原文的鑒賞主體和翻譯主體，入於情，出於文，採用調整、補償或增刪的

翻譯方法，將各詩行的語言成分有機聯繫在一起，這種語內顯化是翻譯過程中不可缺少的。

楚語、楚聲、楚地、楚物貫穿《楚辭》，其地域特色和美學效果與自身的語音、語義和語法系統相輔相成。鑒於此，譯者就要依據英語語境對原文的某些詩學要素進行取捨，從詩行排列、韻律節奏等層面進行整體規劃，確保達意傳情。譯者們以詩譯詩，將原詩的神韻熔鑄於譯詩的形式中。

例 3：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橘頌》）

Here the Orange Tree is found, // Shedding Beauty all around. // Living in this Southern Grove // From its Fate it will not move. ⑩（楊憲益、戴乃迭譯文）

Orange, fair tree of Heaven and Earth, // Hail to thee, here habiteth thou! // Endowed the trait not to be moved, // Thou dost in this southern land grow. ⑪（孫大雨譯文）

Fair tree on earth without a peer, // Laden with oranges, you grow here, oh! // You are destined not to be moved // In the southern land you are loved, oh! ⑫（許淵沖譯文）

Oh, under th' sky and on the earth // Your solemn existence you claim. // You live in th' south with joy and mirth, // Adhering firmly to your aim. ⑬（卓振英譯文）

屈原以物喻人，通過讚美橘樹深固難徙的品性表明自己眷戀故土的情懷以及堅貞不屈的高尚人格。“兮”在《楚辭》中是使用頻率最高的虛詞，不僅具有強烈的抒情色彩，而且也是一種文化象徵。人們一讀到“兮”，通常就和《楚辭》聯繫起來。該詩節上下兩句各為四個漢字，“兮”用在偶句末尾，句式齊整，言簡意賅，但不押韻。翻譯家們沒有受制於原文的四言形式，除了孫大雨的譯文之外，其餘三種譯文都押韻，涉及“aabb”和“abab”的韻式，這是英詩四行詩節中最常見的韻式。許淵沖將“兮”譯成“oh”，情感濃烈，具有詠歎的氣氛。《楚辭》的句式長短參差，用韻寬鬆靈活，適宜歌詠吟誦。要讓《楚辭》更容易被目標語讀者接受，就必須瞭解英語詩歌的審美構成方式。雪萊指出，詩歌雖然不能直接從一種語言到另外一種語言，但卻可以像種子那樣被移植於新的土壤，再長出新植物來，譯者的任務就是決定在什麼地方放入那顆種子並著手移植。⑭由於漢英詩歌缺乏完全對應的形式，因此譯詩形式的改變是不可避免的。譯者既要按照英語的表達習慣遣詞造句，又要進行詩性美學的提煉。翻譯家們根據原詩的內容選擇恰當的譯詩形式，利用英語詩歌語法和韻律特點來傳遞語義信息和文化因素，溝通源語文化和目標語文化。

三、拓展複譯空間，鍛造翻譯經典

典籍精品自身具有經典價值，通過翻譯活動更能發揮經典的輻射作用。《楚辭》英譯要努力成為目標語國家翻譯文學的經典，從而使其中滲透的中國傳統詩學觀、哲學觀、審美觀被理解和接受。《楚辭》中有不少像“仁”、“義”、“忠”、“禮”、“中”、“和”等中華文化核心概念，譯者應以異化翻譯為主，使之與目標語讀者的文化價值觀互融共生，這樣才能真正形成一種文化軟實力。異化意識的重要手段之一是採用“中國英語”的方式，也就是用漢語拼音音譯輔助文外注釋，這樣一方面能準確闡釋中國文化，另一方面這些詞可以作為外來語而逐漸成為英語辭彙的組成部分。

例 4：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懷沙》）

I double my Benevolence, // To Honesty I hold; ⑯（楊憲益、戴乃迭譯文）

Upholding kindness and its deeds apt, // I cherish caution and earnestness. ⑰（孫大雨譯文）

I multiply what's good and right, oh! // Generous, careful, fair and bright. ⑳ (許淵沖譯文)

To enrich myself I rise at five, // And with refinement I do glow. ㉑ (卓振英譯文)

屈原表達了自己的仁義觀念以及忠誠事君的堅定信念。雖然處在朝政腐敗、民不聊生的社會境況之中，詩人始終對君王忠貞不渝。“仁義”是儒家思想的要旨之一，用來指一種普遍的、全面的道德體系。作為一種價值觀，仁義含有仁愛、仁政、民本、正義、公正的意思。㉒該詞分別用“benevolence”“kindness”“good and right”來表達，只傳達了原文的部分深層含義。社會文化反映了不同民族特定的精神生活和價值觀念。在西方哲學概念中很難找到一個恰切對應的詞來概括“仁義”的豐富內涵，在這種情況下，可將其譯為“Renyi”，然後在文末進行相關注解，使目標語讀者理解儒家思想的精髓。適當的文本外闡釋可以避免因單純英譯而產生的意義膚淺現象。借助《楚辭》英譯推廣“中國英語”，可以喚起英語世界讀者對文學民族性的認知，引導他們探索有關中國的價值觀念、文化傳統、習俗制度，這無疑會對傳播中國文化大有裨益。

隨著楚辭學界研究的不斷深化和拓展，《楚辭》複譯也應與時俱進，非常有必要推出具有學術價值、反映最新研究成果的英譯本。每一個譯本都有其可取之處和局限之處，舊譯本的局限可能正是新譯本的突破點，但是這並不意味著後人的譯本就一定會超過前人的譯本。譯者根據自己的審美體驗、作者的審美傾向以及讀者的審美期待重新詮釋，可以滿足不同層次目標語讀者的閱讀和研究需求。複譯還可以糾正原譯的某些理解錯誤，以不斷提高翻譯質量。

例 5: 天何所遷? 十二焉分? (《天問》)

On what rests Heaven wide? // How did twelve hours divide? ㉓ (許淵沖譯文)

Where do the heavens meet the earth? // Why should twelve hours make up a day? ㉔ (卓振英譯文)

“天是從何處顯露出地面的? 太陽與月亮一年十二會的‘十二辰’是如何劃分的?” ㉕《天問》充滿奇幻風格和科學色彩，體現了詩人質疑傳統的精神、探索自然的勇氣以及崇尚“天人合一”的思想，滲透著天地運行規律和人類道德規範的相互映照。天文詞語“十二”可指“十二辰”、“十二次”、“黃道十二宮”、“十二分”。中國古人在觀察天象時發現：月相在一年之中盈虧了十二次，故而認為太陽和月亮一年相會十二次。“十二焉分”是對古人“日與月一年十二會”之說的質疑。許淵沖和卓振英將“十二”譯為“twelve hours”，顯然沒有理解天體運動的規律。

《楚辭》涉及文化、歷史、宗教、民俗、科技、哲學等多種範疇，複譯時應突出研究型和多科性特徵，同時兼顧通俗性和可讀性原則。譯者應參考歷代楚辭學專家的豐碩成果，去粗取精，以便忠實地再現原文的內涵。尤其重要的是，還應樹立明確的版本意識，這是翻譯的基礎。典籍的底本、注釋本、現代漢語譯本、外譯本都有各自的版本。某一外譯本的底本可能是參照了幾種版本的結合體。版本選擇反映了譯者的研究情況、價值取向和文化觀念。在此基礎上，再選擇翻譯策略和翻譯方法。西方漢學家往往迎合他們的主流詩學，傾向於歸化翻譯。然而，隨著當今中外文化交流的不斷加強，以傳播中國文化為宗旨的異化翻譯正日益受到推崇。

四、結語

《楚辭》是中華民族的精神源泉，對當今世界的文化發展也具有啟示意義。《楚辭》英譯與傳播主要突出了三方面的意義：一是思想意義，這是文本中滲透的情感和智慧而產生的強大精神力量；二是審美意義，即這部傳世之作所具備的獨特藝術魅力；三是經典意義，也就是《楚辭》在世界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傳承價值。

四位譯者雖然翻譯方法不盡相同，譯文各有特色，但他們都站在民族世界觀的高度，憑著拳拳愛國之心、頑強的毅力和精湛的譯筆，為《楚辭》走向世界做出了重要貢獻。關注國計民生、倡導和諧施政理念、富於批判現實主義精神是翻譯家們竭力傳播的內容。總體說來，以忠實於《楚辭》的思想內容為基礎，翻譯家們在保障譯文整體異化的前提下都對《楚辭》中的文化現象進行了適當變通，以盡量保留、適當放棄、積極補償為基本原則，直譯、意譯、音譯、釋譯、增譯、刪譯等多種譯法交織互補。翻譯總是包含歸化的成分，也就是要考慮目標語讀者的可讀性因素以及文化傳播的效果，然而歸化並不意味著一味追求譯文的本土化，這樣就會喪失翻譯的民族性和異質性特徵。雖然這四種《楚辭》英譯本在文本理解、文化詮釋、意境再現、思想傳譯等方面還存在某些局限之處，但是翻譯家們都以自己的方式致力於典籍精品的對外傳播，在弘揚《楚辭》的核心價值觀和中華民族深層的精神追求上是一致的。

①方銘：《屈原與時代的連接點》，北京：《光明日報》，2013年2月18日。

②參見楊憲益、戴乃迭譯：《楚辭選》，北京：外文出版社，2001年；孫大雨譯：《英譯屈原詩選》，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2007年；許淵沖譯：《楚辭》，北京：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9年；卓振英譯：《楚辭》，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③參見楊成虎：《典籍的翻譯與研究——〈楚辭〉幾種英譯本得失談》，浙江寧波：《寧波大學學報》，2004年第4期；余燕：《〈涉江〉英譯研究》，《中國楚辭學》（第十三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第158～167頁；馮斗、許玫：《從闡釋學視界融合理論看〈離騷〉的複譯》，成都：《電子科技大學學報》，2009年第1期；繆經、李瑩瑩：《翻譯倫理視角下的典籍英譯——〈楚辭〉國內英譯本探析》，合肥：《合肥工業大學學報》，2011年第5期；郭暉：《典籍英譯的風格再現——小議〈楚辭〉的兩種英譯》，趙敏俐主編：《中國詩歌研究動態》（第一輯），北京：學苑出版社，2005年，第95～109頁。

④趙沛霖：《兩種人生觀的抉擇——關於〈離騷〉的中心主題和屈原精神》，北京：《北京大學學報》，2008年第3期。

⑤⑬⑱⑳楊憲益、戴乃迭譯：《楚辭選》，第87、31、121、103頁。

⑥⑫⑳㉑孫大雨譯：《英譯屈原詩選》，第393、337、411、397頁。

⑦⑨⑰㉒㉓許淵沖譯：《楚辭》，第143、142、

41、179、159、77頁。

⑧⑬⑳㉒㉓卓振英譯：《楚辭》，第107、31、135、119、61頁。

⑩George Steiner, *After Babel: Aspects of Language and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p. 313-319.

⑪徐志嘯：《論屈原在世界文學史上的地位》，湖南岳陽：《雲夢學刊》，1991年第2期。

⑫許淵沖：《譯學要敢為天下先》，北京：《中國翻譯》，1999年第2期。

⑬卓振英：《〈楚辭〉疑難新考》，湖南岳陽：《雲夢學刊》，2005年第5期。

⑭朱良志：《楚辭的美學價值四題》，湖南岳陽：《雲夢學刊》，2006年第6期。

⑳Susan Bassnett & André Lefevere, *Constructing Culture: Essays on Literary Translation*,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p. 58.

㉑郭沂：《中華價值世界意義》，北京：《光明日報》，2011年11月26日。

㉒吉家林：《屈原〈天問〉與古人“天形態觀”》，湖南岳陽：《雲夢學刊》，2007年第6期。

作者簡介：嚴曉江，南通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楚辭研究中心教授，博士。江蘇南通 226001

[責任編輯 桑海 李俏紅]